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二九期 ——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2d)

【知情者言】	亲历 1976 年 2 月中央“打招呼”会议	周启才
【历史回顾】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次突击采访	王煊长
【口述历史】	风雨八十载——洗恒汉自述 (节选下)	洗恒汉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知情者言】

亲历 1976 年 2 月中央“打招呼”会议

• 周启才 •

◇ 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打招呼”会议。江青借“文冠果、油沙豆”找茬闹事。

1976 年 1 月 28 日，毛主席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2 月 2 日，毛主席又提议，经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对华国锋的这两项重大任命，“四人帮”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内心极为不满。他们期望已久的在邓小平下台之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美梦，如同竹篮打水一场空。

1976 年 2 月下旬，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是经毛主席批准，由华国锋主持，分三批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的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的负责人，中央群众团体党委、党组的负责人等。参加会议的人员住在京西宾馆。中央办公厅抽调所属各单位的工作人员，组成会务组、记录简报组、安全警卫组、生活服务组、医疗保健组等，为会议服务，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当时我任会务组的负责人，武健华、王志民任记录简报组的负责人，我也是这个组的负责人之一。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会务组。

第一批“打招呼”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除在京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还有问题较多的云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五个省的主要负责人及有关人员。

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首先传达了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而后发表了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主席审阅同意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要把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中有的人，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当时，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奉命派了两名记录人员在主席台幕后做记录，我也坐在主席台幕后，便于中央领导有事召唤。

这次会议，开得时间不长。散会后，按照排序惯例，华国锋走在前面，从主席台后面走向北京厅。其他政治局成员也从主席台后面退场。这时，中国科学院的两位负责人胡耀邦和方毅把我叫住，要我在华国锋方便的时候，向华报告中科院需要中央帮助解决的问题。他们一边说，我边听边记。正在这时，走在北京厅附近的汪东兴喊我说：“周启才，江青同志有事找你。”我听完胡耀邦、方毅要我转告华国锋的事情后，立即走向北京厅。这时江青在北京厅门外站着。我走到她面前，看她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她对我说：“外地给我送来一些文冠果和油沙豆（注：两种植物种子），我派人送到京西宾馆，你们给我发给参加会议的各组，告诉他们是我送的。”我说：“好，我回去就办。”这时，在北京厅里面的华国锋有事喊我。江青听华国锋喊我，就不讲话了，神色表现不满。我以为江青已经讲完了，就转身去了北京厅。华国锋向我交待了印文件的事。

我回到京西宾馆，会务组的值班秘书向我报告了江青派人送来文冠果和油沙豆的事，并说已分发给各组。不久，江青秘书打电话给我说：“首长指示我给你打个电话，问文冠果和油沙豆的事，首长是怎么向你讲的？在什么地方向你讲的？办了没有？”我说：“首长是在北京厅门口外面站着向我讲的，说派人送到京西宾馆会务组，由会务组分发给参加会议的各组，说是江青首长送的。此事已经办完了。”过了不到十分钟，江青秘书又打来同样内容的电话，我又做了同样内容的回答。又过了十几分钟江青秘书又打来同样内容的电话，我又做了同样内容的回答。这样的电话，前后打了四次之多。在这四次来往电话中，虽然我和江青秘书很熟悉，但他就是一字不差地向我讲江青说的那几句话。开始我没在意，后来我和值班秘书都觉得情况异常，但对江青如此做法，都不知原因何在。

这天晚上，江青秘书为江青交办的另一件事打来电话，告诉会务组值班秘书，要会务组向中国电影资料馆要电影目录。我知道这种事通常是由警卫局服务处电影放映组办理，这回江青指示要会务组办理，并规定时间，要按时送到江青手上，不知她又设了什么圈套。会务组办好后，我派值班秘书送到钓鱼台江青住地，并叮嘱要亲手交给她秘书，并请他立即送给江青看。江青秘书当面告诉我派去的值班秘书说：“电影目录送首长看了，首长没意见。”值班秘书回到京西宾馆，向我报告了这一情况。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青当众大发淫威。

第二天下午，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会议，会议内容我记得是听取参加会议的五省负责人汇报本省的问题。我到会服务。由于昨天发生的“文冠果、油沙豆”和“电影目录”问题的异常情况，我在会场尽量躲着江青，坐在西大厅远离会议桌的一个角落。由于我个子较高或江青可能早已看到了我，散会时江青冲着我喊道：“周启才，你过来！”我走到她跟前，她大声指责说：“周启才，你克扣我，昨天晚上叫你送的电影目录，你为什么不送给我？”我回答：“我派值班秘书准时送去了，交给你秘书，你秘书说：‘交给你看了，你没意见。’”江青听后，大喊大叫，说：“你不老实。”我顶了她一句：“事实如此。”当时我心想你才不老实，明明送给你看了，你颠倒黑白，硬说没送给你，但表面上我仍缓和地说：“江青同志，我有什么错误，请你批评指出，我可以检讨、改正。”她说：“你有什么错误你自己心里明白。”我又顶了她一句：“我不明白。”这时江青气得满脸通红，两眼瞪得圆圆的，手也有些发抖，跺着脚尖叫道：“周启才，你要知道，我是老造反派！”因为刚散会，大家都还没有离开会场，见江青这样大喊大叫，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停下来，站在那里。华国锋见此情形，上前两步，拉了拉我的上衣后衣角，示意我离开。江青在这种场合如此大发淫威，一些中央领导人都为我捏一把汗。

事后，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他的办公室找我谈话。汪东兴对我说：“你当着那么多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面顶撞江青，捅了娄子。今天江青来找我谈话，向我打招呼，意在要整你，让我给顶回去了。”“江青说：‘周启才不是我们的人’，我一听就火了，我责问她：周启才怎么会是你们的人呢？他是党的人，他从中央在香山时就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秘书局工作，快三十年了，毛主席对他印象很好。他到秘书局工作，是毛主席、周总理为加强秘书局的领导力量，批准同意的。”汪东兴接着对我说：“我告诉江青，我们党历来有规矩，不准拉帮结派，大家都是党的人，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工作。毛主席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你是知道的。江青听人说：‘周启才最近被人拉走了。’我问江青，他最近被谁拉走了？我怎么不知道，你讲给我听听。江青听后，没有吭声抬腿就走了。”

在谈话中，汪东兴告诉我：“最近‘四人帮’的反党气焰又嚣张起来。邓小平同志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岗位下来后，‘四人帮’对毛主席关于华国锋任命的决定非常不满，但他们对主席不敢怎么样。对华国锋他们没放在眼里，看不起，多方刁难。江青说最近你被人拉走了，她不敢说名字，实际上是指华国锋。”

我听后说：“我现在才明白，从文冠果和油沙豆问题开始，几天来，江青见我就批我，调子越来越高，还让我给她写检讨，说这关系到我的政治生命问题。我让她指出我的错误，她老是那句话，说我心里明白，还说她有人证，她的秘书、警卫、护士都在场。”汪东兴对我说：“你没错，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北京厅喊你，交待你办事，你应该及时去办。江青让你给她分发文冠果和油沙豆，屁大的事，也给她办了，你有什么错？对江青你要顶住，更不要给她写什么检讨，一个字都不要给她写。你上次送给我看的那个不到三页纸的‘检讨’，只是个表态信，送给江青也过不了关，我看后让秘书退给了你。”我说：“我已经撕掉了。”

华国锋在京西宾馆同我谈到江青最近找茬儿大发淫威时说：“你没错，错在江青。你做得对，她让你给她写检讨，不要给她写。”李先念托纪登奎给我带口信，说我上了江青的黑名单，江青要整我，要我工作中特别小心谨慎。吴德也同我打招呼，要我沉住气，撑得住，对江青多加小心。几位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和安慰，使我心里有了底。

◇ 江青单独召集十二省区会议，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第三批“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也不报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也不通知会务组，于3月2日中午，以“看望”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名，单独召集十二省区开会。当时会务组的值班人员，看到与会人员都纷纷去京西宾馆会议厅，不知是怎么回事。按当日中央对会议的日程安排，下午是各组联系本省区的实际，继续讨论落实《毛主席重要指示》和华国锋的讲话精神。江青突然改变了会议日程，事关重大。值班秘书将此事报告给我，我不顾中央领导人中午休息，马上拿起保密电话，将此事报告给华国锋，并说各省区人员正在向会议厅集中，会议还未开始。华国锋听后，顿了片刻很生气地说：“知道了。”接着我马上又打电话报告给汪东兴，汪在电话中问我：“此事国锋同志知道了吗？”我说：“知道了，我刚电话报告过。”汪又问：“国锋同志有指示吗？”我说：“国锋同志听后对江青此举很生气，顿了片刻，才对我说：‘知道了’。”汪东兴听后也说了一句“知道了”。

会后经武健华、王志民和我研究，由我和王志民到华国锋家里当面详细向华国锋汇报了江青开会的情况。接着又将江青讲话的记录稿报送给华国锋。江青在讲话中，用她一贯的演技，极力吹嘘、表白、美化自己，掩盖她的错误，蒙蔽不知情的与会人员。她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同志，不赞成全盘否定邓小平的重要指示，用最恶毒的语言，造谣、攻击、谩骂邓小平，诬蔑邓小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大汉奸”等。

江青开始说：“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江青这段讲话，据我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时，直接和间接看到和听到的真实情况，完全是歪曲事实，掩盖真实情况。

1975年4月23日，毛主席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主席批示中后面几句话，明显是批评江青的。毛主席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了毛主席这一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用事实揭露和批评了江青及以其为首的“四人帮”反周总理的行径。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讲话中，主要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主席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遵照毛主席5月3日讲话中点名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并要“大家再议一下”的指示，报经毛主席批准，5月27日，由邓小平主持先后召开了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严重错误。几天后，陪同毛主席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将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和江青等在会上的表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6月28日，江青被迫向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她在检讨中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承认她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和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反周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剑英的错误，并承认确实存在着以她为首的“四人帮”。

事实十分清楚的说明，1975年4月27日和6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报经毛主席批准召开的，会议情况和会上对江青及其为首的“四人帮”的批评，会后也都及时报告了毛主席，并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江青在她单独召开的十二省区会上说的“邓小平在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完全是一派胡言，欺人之谈，造谣攻击、诬蔑邓小平，证明她过去向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检讨”是假的，现在她是在借机翻案。

毛主席得知这次江青单独召集十二省区会议讲话后，很生气，严厉批评江青，亲笔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并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

◇ 江青重提“风庆轮”事件，要求印发“风庆轮”材料。

“风庆轮”是当时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级轮船。为出航安全起见，一开始交通部远洋局规定使用国产“五大件”的轮船包括“风庆轮”只跑近海。但这一决定却被认定是交通部对国产船百般刁难。1974年9月30日，“风庆轮”首次远航归来。江青借机指责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矛头直接针对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斗争激烈，邓小平很生气地顶撞了江青。

这次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开始，华国锋曾同意江青提议将登有“风庆轮”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印发到会人员参阅。在江青单独召开的十二省区会讲话中，她又重提“风庆轮”事件，恶意攻击邓小平。会后，她找了她参加的那个小组的记录简报人员到钓鱼台，又让她秘书通知我也要去。此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去后，江青拿着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批语的原件，念给记录简报人员听。江青对记录简报人员说：“我口述，你们记录，整理成一份会议简报印发给这次参加会议的每个人员，还要补发前两次参加打招呼会议的每个人员。”她指令记录简报人员回京西宾馆后立即整理，整好后交给我，指令我凌晨五点要准时送到她那里。

江青口述完，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我听她小声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宁可犯错误。”因为“风庆轮”的事，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她。她走出会议室，在门口又批评我顶撞她的事，让我给她写检讨，说：“这关系到你的政治生命问题”，还说她有人证，指着站在她身边的秘书、警卫、护士，说“他们都在场”。秘书、警卫、护士无人吭声。

回到京西宾馆，已近凌晨三点。这时我最担心的是江青看了简报稿后，直接批到会务组要我给她印发。这就很难办了，问题就大了。我想给汪东兴、华国锋打电话报告此事，他们又都在睡觉，不便打搅。最后，我想了一个阻止她批到会务组印发的办法，即使她批到会务组印发，我也有回旋余地。这个办法就是简报送她时，我要写一封短信给她，说明简报要经中央领导批准后，我们才能办理。凌晨四点多，简报组的同志把简报稿整理出来后送到我办公室。这时距离江青规定的凌晨五点要准时送到她那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赶紧拿起笔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记得信的内容是：

“江青同志：

遵照您的口述和指示，记录简报组的同志已将简报稿整理出来，现送上，请审定。

您指示：此简报印发这次参加会的全体人员，并补发前两次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员。待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后，我们即按此办理。”

这封短信，首先说明是江青亲自指示并口述内容让记录简报人员整理的，其次讲了江青要求分发的范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报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后，我们才能办理。信和简报稿我封好后立即派机要通讯员按时送到了钓鱼台江青那里。

上午没有动静，下午江青秘书给会务组值班秘书来电话，问简报中央领导同志批回来没有？值班秘书回答：“这事我们不知道，没经过我们上报，我们不清楚。”并将此情况报告给我。我说：“回答得好，江青那里再问，就这样回答。”以后江青秘书又奉命问了两三次，就不再问了。后来知道，江青将“风庆轮”问题的简报材料报给华国锋要求印发。华国锋写信报告毛主席，请示可否印发。3月10日，毛主席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材料一事批复华国锋：“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江青再次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华国锋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 江青用《创业》、《海霞》等影片，攻击、诬蔑邓小平。

江青在十二省区讲话中，隐瞒真相，用《创业》、《海霞》等影片攻击、诬蔑邓小平。讲到《创业》时，她对毛主席对她的批评，只字不提，只说信（指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写给毛主席的信）“确确实实是邓小平转的。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伟大，主席并没有看这个电影。《创业》这个题材是我推荐的，拍得粗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

真实情况是，当时毛主席听了秘书读完张天民的信，非常生气，即刻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主席这个重要批示，经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发后，有力地打击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嚣张气焰和倒行逆施，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了文艺界广大知识分子同“四人帮”的斗争。

江青在讲影片《海霞》时，攻击邓小平：“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为了《海霞》，那可是开创我们党的记录，历史上没有过的，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的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这是江青修改讲话记录稿后的话，她当时讲的原话我记得是：“中央办公厅派人去抄了文化部长于会泳的家，我料他们没有这个胆子，背后一定有人指使。”

实际情况是1975年7月26日，邓小平收到《海霞》主创人员谢铁骊、钱江请他转呈毛主席的信，邓小平很快将信转送毛主席。该信反映了文化部负责人诋毁电影《海霞》和打击创作人员的情况。1975年初《海霞》制作完成后，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肯定。文化部负责人却根据江青的旨意给《海霞》提了几十条“意见”，谢铁骊等进行修改后，文化部仍不予通过，说该片“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并查封了全部底片和样片。

1975年7月29日，毛主席在谢铁骊、钱江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收到毛主席批件后，迅即印发给在京的各位政治局成员。印发后大概过了二、三天，时任中办秘书局文电处处长、后任秘书局副局长的陈恩惠到我办公室报告说：“东兴同志秘书来电话说：‘汪主任交待：今晚七点半政治局同志在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审看电影《海霞》，通知政治局同志，并与文化部联系，把片子调来。’”过了一会，文化部值班人员回电话说：“《海霞》影片已经修改拆了，不能看了。”陈恩惠把这个情况立即电话报告汪东兴处。汪东兴对文化部的答复有疑惑，指示我：“叫陈恩惠带上警卫局服务处电影放映组的负责人于器海，亲自去文化部查明情况，看是怎么回事。”

遵照汪东兴的指示，陈恩惠同于器海迅即驱车到文化部创作组找到部长于会泳，开门见山地对于会泳说：“我们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今晚中央政治局同志要审看电影《海霞》，派我们来找于部长调取片子。”于会泳听后说：“《海霞》影片已经修改拆了，不能看了。”陈恩惠、于器海听后，感到于会泳同文化部值班室的回答，如出一辙，说法口径完全一致，一字不差。为了进一步查明情况，便问：“于部长，已经修改拆了不能看的片子现在在哪里！”于会泳答：“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陈恩惠、于器海表示要去“北影”看看。于会泳说：“我派人和你们一起去，给你们领路。”于器海说：“‘北影’我们很熟，经常联系，不麻烦了。”当时他们很担心文化部操控“北影”，隐瞒真情，片子找不到，取不回来，影响中央政治局晚上审看。

陈恩惠、于器海到达“北影”后，向接待人员表明身份，说明来意。接待人员很高兴，说：“文化部说得不对，《海霞》影片是修改，没有拆，完全能演能看。我们这里存着好几套完整的样片，《海霞》底片也存在我们这里。”听后，陈恩惠、于器海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汪东兴交待查明情况的任务完成了，今晚中央政治局审看《海霞》影片有保证了。这时陈恩惠给我通了个电话，说明查找影片《海霞》遇到的阻力和终于查到的过程，并问底片是否也拉回来？我告诉他，如何办好由你酌定吧！陈恩惠、于器海从“北影”取回一部《海霞》样片，并向接待人员交待，《海霞》底片你们一定要保管好，不要出任何差错。

“北影”广大干部、职工得知中央办公厅派人来调《海霞》影片，中央政治局要审看，十分高兴，许多人围聚在他们的汽车前，主动帮助装车，充分表明文化部负责人秉承江青旨意，扼杀影片《海霞》，打击创作人员的行径是十分不得人心的。

陈恩惠、于器海顺利从“北影”取回了电影《海霞》样片，及时报告了汪东兴。当晚在大会堂小礼堂进行了放映。中央政治局邓小平、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吴德等参加了审看。张春桥也参加了审看。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没有参加。参加审看的还有文化部的于会泳、浩亮和《海霞》主创人员谢铁骊、钱江。

据吴德在他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说：“演完后，小平同志在休息室里主持了对影片的讨论。先念、陈锡联和我去了，张春桥也在，其他的同志我记不清了。”“小平同志说：‘大家看后有什么意见？’”我说：“这个片子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艺术上需要一些加工。现在，已经重拍了一些镜头，是不是把原来拍摄的和后来加工重拍的一些镜头连接起来制作，然后对外放映。”“小平同志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春桥说没有意见。”“小平同志对张春桥说：‘你管文化部，由你通知文化部，就这样演出吧。’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海霞》问题被邓小平解决后，江青很不满，大发了脾气，她那时被称为文艺界的旗手，没有人敢讲话，但小平同志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硬顶了江青。”

事实充分说明，江青在她单独召集十二省区讲话中，说中央办公厅派人去抄了文化部长于会泳的家，纯属无中生有，混淆视听，恶意诬陷、攻击邓小平。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汪东兴告诉陈恩惠：“江青要追查调电影《海霞》片子的人，我给挡回去了，我说调电影片子是他们份内的工作，你看电影不也是他们调片子吗？江青没再纠缠。”

◇ “四人帮”齐上阵，到各组煽风点火。上海组告密状，诬会务组扣压简报。

“打招呼”会议期间，“四人帮”得意忘形，气焰嚣张。他们夜间阴谋策划于密室，白天频繁参加各省、市、区的小组会，煽风点火，指使亲信，多方串联。他们置毛主席关于会议的指示于不顾，更没把华国锋及其讲话放在眼里。上海组参加会议期间，成为他们活动的据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断以“看望”为名，到上海组召集帮派亲信，出谋划策，散布谣言，鼓动他们多发言，多出简报。一天晚上，姚文元、王洪文来上海组，上海的几个亲信

向王洪文告状，说他们的发言简报，一连二、三天还没发下来，诬告会务组扣压了他们的简报。王洪文先把简报组的同志叫来，声色俱厉地质问：“你们为什么扣压上海组的简报？”简报组的同志回答不清楚，王洪文又让他们叫我来。叫我的同志告诉我，王洪文正在发火，说扣压了上海组的简报。坐在马天水外套间的王洪文见我来了，怒气冲冲地说：“方才上海的同志向我反映，他们组的发言简报，二、三天还未印发下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们扣压了简报。”我马上回答：“我们会务组没有扣压简报，简报组也没有扣压简报。中央自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问题后，就有明确规定，简报中凡是提到哪位政治局委员的发言内容，必须事先送本人审阅，本人审批同意后，才可印发。几年来历次会议，我们都严格按中央这个规定办理。上海组的简报，都及时送到江青首长那里去了，她还没批回来。”王洪文听后，没再说话。因为他知道中央这个决定。我走后，听说王洪文当即将此事报告了江青，江青自知误了事，立即找来她的亲信，连夜帮她看阅改报稿，忙了一夜，江青在每份简报上签字后，第二天退回来印发。

王洪文在参加一个小组讨论会时，作了长篇发言，他事先准备了长达30页的发言稿。讲完后，记录简报人员问他如何整理简报时，他说：“我这次发言，不整理简报，稿子可给你们存档，将来作为我的罪证吧！”有关记录的同志向我讲述此事怎么办时，我说：“只能按他的意思办，但要让他在发言稿上签上名。”后来得知，王洪文准备的这个发言稿，是想以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身份在会上讲话用的。

◇ 江青批评指责张平化，张平化泰然自若顶江青。

江青在单独召开十二省区会的讲话中，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进行批评指责，她说：“张平化来了没有？”张坐在位子上答了一声：“来了。”她说：“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张平化回答：“是。”江青说：“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毛主席看，是不妥当的。我对这个戏内容有意见。”“《园丁之歌》可以上演，但要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张平化坦然自若地说：“现在没有见谁有这个想法。”江青一听叫了起来：“你是完全翻案！”张平化不甘示弱，顶了江青一句：“不是。”

江青气急败坏，指责张平化：“你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那只是有缺点吗？那应该说是错误。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海瑞罢官》那篇文章的。我今天提出来，就是你太积极了，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去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好嘛，上映嘛，照原样上映嘛。”“你在那里翻案，你有没有执行邓小平那一套？你自己要做深刻检查。”“你这个湖南就不受影响？你看你气鼓鼓的，你有问题，我在这儿跟你讲理呢。”“我就是一个马前卒，过了河，不回头。”“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师。”张平化没再搭理她。

这次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斗争复杂。在会议期间“四人帮”借机兴风作浪，阴谋篡党夺权，指使他们的帮派骨干，造谣生事，破坏邓小平整顿取得的大好局面。相当多数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对“四人帮”表面上应付，内心却恨之入骨。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四人帮”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作者为离休干部，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

□ 《世纪》 2007年第6期

~~~~~

【历史回顾】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次突击采访



• 王婧长 •

◇ “中央文革记者站”

“中央文革记者站”成立于1966年9月初，第一批记者共约二十六七人，是新华社军事部和驻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军事记者，都是现役军人。1966年年底，由于各地都乱了起来，人力不够，才从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调来一批记者和编辑，两者加在一起共约40人左右，不是军人的无一人穿军装。再后来又从各大军区、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军队干部155人，从马列学院调来14人。前者都是军人，仍穿军装，后者是地方干部，仍穿便衣。直到最后“记者站”撤销时，总共也只有236人。“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职责是什么？明确地说，只有一句话，就是“向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反映真实情况”。

我是第一批抽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之一。据我当时的记录，“记者站”成立大会当天，王力向我们交代任务时说，“五一六”通知公布后，全国像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天津、兰州、宝鸡等许多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都迅猛地开展起来，一些省、市党政机关已经陷于瘫痪状态。毛主席说，“这个城市、那个城市都闹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派人去看看。中央不要去人，派一些记者去”。这样，就从新华社把你们这批军事记者调来了。你们的任务是“向毛主席和中常委提供各地的真实情况。当地发生的重要事件，要随时向北京报告，一个地区或那里的某个单位发生了什么大事，要作系统翔实的综合调查报告”。当时，王力还特别说明，“你们任务是直接向毛主席和中常委负责，由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领导。”那天到会的除王力外，还有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谢镗忠、新华社副社长王敏昭、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胡痴等人。他们也都讲到成立“记者站”是毛主席提出的，并且告诉我们，毛主席对记者的要求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客观求实，不偏听偏信，不介入当地的运动，也不受当地党、政、军机关的领导，直接向党中央负责。

听了上述的传达，我们都深感执行这一任务的光荣，更感到肩负责任的重大。可以肯定地说，在“记者站”工作的近三年时间里，这批记者中的绝大多数都做到了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也无论遇上什么艰难险阻，哪怕是双方正在激烈枪战的武斗现场，都要冒着生命危险赶到那里去，深入现场观察了解，做到亲见、亲历、亲知，掌握第一手材料，并且严格按照毛主席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尽力做到对各方面的情况都作详细的了解，客观求实、不存偏见地向上反映。事实上，在当时情况下，我们都把这看作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在那段岁月，对全国各地情况和问题的反映，恐怕只有我们这批记者才是做到了亲见、亲闻、亲知。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也难免有同志受“左”的思想影响，在某些事件上作过不够客观的报道。但是，即使有这类问题，记者也并非有意为江青做“工具”，更不是江青的“爪牙”。

◇ 要派记者去调查

1967年元旦的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召集“记者站”全体人员开会，说是给大家祝贺新年，实际是布置新一年的工作（此时，记者站已组建三个多月，除我们最先调来的20多名新华社军事记者外，又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马列学院、解放军政治学院和部队抽调一批人）。当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姚文元等人到会并讲了话。江青先说了一段“同志们很辛苦，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及时向毛主席、中常委和我们小组反映了许多有价值的情况”的客套话，然后话锋一转，“但是，是否全面，是否有重点呢？不是的……西藏和新疆现在就还是空白点，没有人去，这使我很吃惊。齐齐哈尔的人撤回来了（指记者），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工作要全面，要有重点，西南就是重点。那里有直升飞机，可是连机场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人家准备与中央对抗的呀！”她接着说：“同志们，那边来的红卫兵小将说，渡口只挂刘少奇的像，

不挂毛主席的像；只喊刘少奇万岁，不喊毛主席万岁。情况很复杂呀！”

事过没两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新华社军事记者）又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说是江青讲了，“渡口领导班子是彭真、贺龙线上派去的，彭德怀也在西南三线，情况很复杂。那里还有个安以文，是渡口市委的书记，他是‘叛徒’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的弟弟。这个安以文，他封锁毛主席对三线建设的指示，搞‘独立王国’，要派记者去看看，报告主席和中央。”她还煞有介事地说：“去的人很可能被他们抓起来，要派有经验的记者去！”

江青把渡口市的形势讲得如此严重、险恶，派谁去好呢？徐学增为此十分为难，他怕果真如江青所说，派去的同志被抓、被关，甚至有生命危险。那时的我们，满脑子装的就是要“忠于毛主席”，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负责，不论有何困难，都要保证给毛主席和中常委提供最准确的第一手材料。于是我就跟老徐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我是四川人，又在四川新闻界工作多年，有许多熟悉的同志，即使真的被抓、被关，也会有人救助，会很快给记者站报信的。”老徐想来想去，觉得我去确实比较合适，但是他仍不放心，又增派一名比我年轻十来岁的杨心灵同志与我同去。杨心灵是从成都军区调来“记者站”的，对四川也比较熟悉，有许多方便条件。不仅如此，老徐考虑到我们的安全，又规定我们两人以不同的身份去，我仍用《解放军报》的记者证，小杨改用《红旗》杂志的记者证。这样，即使渡口形势果真如江青说的那样险恶，我们两人也不至于同时被抓，总有一人可以把情况报告北京。于是，我和杨心灵稍做了些准备，就在1967年1月中旬踏上了去渡口的路。

#### ◇ 渡口人话建设

渡口，就是现在的攀枝花市，它原本是四川与云南接壤的一片不毛之地。由于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建设”，在中国后方建设起一个“打不烂”的备战钢铁基地，渡口地处丘陵起伏的山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钒钛磁铁矿、煤炭和石灰石等矿产资源，中央便组织了大批的人力到这里来，着手地质勘察和资源调查，进行开矿、建厂的设计与建设。可是，这个正在建设中的钢铁基地，怎么会一下子就“不在我们手里”了呢？我心里实在有些纳闷。但是江青讲得那么具体，那么严重，我们又怎敢不相信呢！

当飞机在成都机场降落后，我先去新华社四川分社看望几位老同志，谈话中顺便提到我要去渡口采访（当时记者站有明确规定，我们执行的任务的具体内容是要严格保密，不许向外人透露的），想看看他们有什么反映。可是，他们听说我要去渡口，不但没有丝毫异样的表情，相反热情地告诉我，分社的郭丕宵同志已去那里采访了，到那里你们就会碰上上面的。他们讲得是那样的轻松自然，同江青讲的险恶情况迥然不同。

第二天，我和杨心灵就乘飞机去了西昌。在西昌军分区住了一夜，早餐后军分区派一辆吉普车送我们直奔渡口。记得那汽车道是新建不久的土路，路两侧的山坡上长满了茂密的树木。汽车在群山环抱的山坳里跑了一阵，随后就沿着金沙江岸前行。进入正在兴建的渡口市区后，我们更加注意地观察这里为数不多的几条街道和路口，以及当地机关、学校的大门。我们看到大门照壁上挂的都是毛主席画像，根本没有刘少奇的。此时，我脑子里浮现出江青讲到渡口时的情景，她的面部是那样严肃清冷，声音是那样尖利刺耳，语调是那样惊诧和愤怒。我实在有些茫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我们已经置身渡口，亲眼看到了这里的一切，感受到了这里的政治气氛，但是，要保证向毛主席、中常委提供第一手真实准确情况的职责，使我们不敢轻易否定江青那句“渡口不在我们手里”和“人家要与中央对抗”的定论。

我们在渡口住了下来，不过并没有按照江青、王力的要求，住到“革命群众组织”中去，我们还是按老规矩，住在部队，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受派性干扰，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取得各个群众组织的信任，了解到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和意见，做到客观求实，不存偏见。当时，渡口只有两个军事单位，一个是市人民武装部，一个是铁道兵第五师。考虑到铁道兵第五师是外来参加建设的，不像市人武部同当地领导机关联系多，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于是就住在铁道兵第五师。

为了弄清渡口是不是在我们手里，渡口领导班子是否真如江青所说，是所谓“黑线”上的人，他们是否“不突出政治”，“不传达贯彻毛主席对三线建设的指示”，我们的采访调查工作没有按老办法直接调查市领导班子的情况，而是采取撒“大网”的方法，先从了解渡口的建设情况入手。我们想，通过了解当地实际工作的状况，对渡口领导班子的工作状况和指导思想，可以看得更加具体，更加清晰，也更加真切。于是，我们去矿山、工厂、建设工地，找工人群众座谈，去学校、商店访问教师、店员，去居住区找老人和职工家属闲聊，听他们谈渡口的建设与变化，了解他们对当地领导和工作的看法。通过这样广泛接触群众的采访漫谈，我们发现，渡口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毛主席说过，渡口建设不好，他老人家睡不着觉。无论工厂、矿山和基建工地的工人，在讲述当地建设情况和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时，都很自然地就谈到了毛主席对渡口建设的指示和要求，例如“要同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争时间，抢速度”，“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要把渡口建设成打不烂的备战基地”，等等。

谈到渡口的建设，工人们无不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刚来时这里还只是一片山地，没有房屋，更没有街道和商店，路也是他们来后新开出来的。他们当时住的是帐篷，附近没有农民，买不到蔬菜，吃的是盐水拌饭。那时电厂还没有兴建，他们开矿山，炸岩石，全靠用钢钎、铁锤手工打炮眼，新开的汽车道凹凸不平，好多机器设备都是靠人力搬运上山的。听了工人们描述渡口初建时的情景，我们说：“你们可是够苦够累的了！”他们却说：“苦点累点算啥，毛主席说了‘落后就要挨打’呀！不早点把三线建设好，咋行？”“说苦，那时也真是苦点、累点，可大伙心里舒坦，干得挺欢的。”“那阵，真正是‘三同’哟！不管是领导，是干部，是技术人员，还是工人，吃的住的都一样。我们的第一座‘干打垒’房子，还是最先到这里的领导干部、勘探设计人员同大伙一道，从金沙江里一盆一盆地端水上来，自己动手和稀泥垒砌成的哩！咳，那些工程技术人员过去都没干过这类活，有的又是近视眼，端一脸盆水上岸，时常弄得脸上又是汗又是泥的，逗得小孩子叫他们‘花猫’。”有的老工人附耳悄声对我们说，你们去看看那些宿舍就知道了，至今这些领导干部还是和我们大家住在一样的房子里的。徐总指挥（徐驰到渡口时尚未建市，是渡口建设的总指挥）一到渡口，就定了三条规矩：开大会，领导干部讲话不许拍照，不许录音，下基层不许坐轿车。我们在渡口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是出发前江青所说的那样。现在又亲耳听到工人们讲述的这一切，怎么也得不出“渡口不在我们手里”的结论。

#### ◇ 查访“走资派”

这里的领导干部究竟是些什么人，是不是如江青所说，是“黑线上的”？我们必须对渡口的主要“走资派”作详细调查。

渡口市的主要领导当时总共有三人，即市委第一书记兼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长徐驰，副书记兼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长李非平，副书记兼建设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安以文。我们到达渡口时，徐驰与李非平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了，只有安以文在。徐驰来渡口前，是国务院冶金工业部的副部长，中等个子，瘦瘦的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轻言细语。我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曾多次送过我写的社论请他审阅。从他阅后退回的清样可以看出，他每次都是认真仔细看过并做了修改的，并且每次他都要在社论清样的末尾工工整整地签上“徐驰”二字和日期，以示他对审阅的稿件负责。到渡口后，从我听到工人群众的反映看，徐驰从冶金部调来渡口后，

他在政治和生活上一如既往，对自己和干部的要求都是严格的，对毛主席有关三线建设的方针和要求，也是认真贯彻执行。当然，我们也听到有些工矿的领导干部说他重技术轻政治，有单纯业务观点。但是只要认真想想，要按照毛主席的要求，把渡口建成“打不烂的备战基地”，这副担子该有多重！徐驰无论在工厂、矿山的勘察设计和施工建设上，还是在建成后的生产技术与质量上，怎敢马虎？他调来渡口搞钢铁基地建设，完全是对口的需要，因为他是冶金部的副部长，熟悉业务，也有领导经验，显然不可能是什么人安插来“控制地盘”、“准备与中央对抗”的。

至于李非平，群众反映最大的，就是作为第一副书记，他不关心思想政治工作，把精力都放在勘察设计、建设施工、道路运输上去了。也有些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说他用人搞宗派主义，主观武断，搞一言堂。据我们调查了解，李非平原本是冶金部基建司司长，因为他熟悉冶金基建业务，徐驰才把他从冶金部要来协助自己，抓建设工程质量，以保证把渡口建成“打不烂的备战基地”。应该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抓业务上，既是必需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有人反映李非平用人搞“宗派主义”，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从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看，渡口的人员全是临时从全国各地钢铁企业抽调来的，彼此都不甚了解，而李非平熟悉了解的，自然更多的是从冶金部调来的人，这就难免使人感到他在用人上有些厚此薄彼。但是，无论从正面和反面的意见看，同样说明李非平是按照毛主席的要求，集中精力建设渡口的，不能说他突出政治，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要求。

我们在渡口时，市里的主要领导只有安以文在，而且他又是江青点名的重点人物，是所谓“叛徒”安子文的弟弟，是“黑线”上的人，是封锁毛主席有关渡口和三线建设的指示的“走资派”，他自然成了我们集中调查了解的主要对象。当时，安以文已经被“打倒”，被列为渡口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人物，只是还没有像内地那样被关押起来，而是被勒令呆在家里，随时由群众组织抓出去批斗。

我们请铁道兵第五师的同志引领去安以文家。果然如同工人同志们说的，这位市委副书记兼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确实跟职工一样住在简易工房里。我们敲开门，安以文正在家里看报。他个子不高，身体较胖，看上去约莫40多岁。可是刚同他搭上话，我们就大吃一惊：安子文是山西人，怎么他这个弟弟讲的却是一口河北话呢？问明后，才知道，他果然是河北人。看来，这个安以文的父母先前没有料到，他们的儿子会在几十年后遇上“文化大革命”，不该把他的名字取得同安子文只有一字之差，让江青想当然地定为安子文的“亲弟弟”了。

#### ◇ 事实攻破谎言

安以文与安子文是亲兄弟的问题排除了，但是安以文是江青点名“不宣传贯彻毛主席有关三线建设的指示”、“不突出政治”的主要人物，而且又确实是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和渡口建设总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江青指出的那些问题他都责无旁贷，是应负主要责任的。那么，安以文究竟是怎样工作的呢？我们找安以文调查时，也是采取“大包围”的办法，先请他谈渡口建设发展的情况，以便从中了解他是怎样抓自己分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

开始，安以文没有直接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而是主动向我们介绍他的简历。他告诉我们，他是富农家庭出身，13岁参加八路军，1949年随军入川，先是参加改造刘文辉起义部队的工作，1950年转业到了重钢，担任党委副书记、书记，1960年“反右倾”时，他受到批判，下放到重钢下属企业当了一年厂长，中央扩大会议后才甄别。他说，他在重钢工作十多年，因为老是处理不好与重庆市委领导的关系，曾向冶金部提出希望调离四川，并直接向王鹤寿和余秋里提出过这一要求。后来渡口建设上马，1965年4月他就被调到渡口。他说，他的主要问题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作风粗暴，在干部使用上，重才轻德。他离开重钢时“四

清”尚未结束，他是检讨了这些错误才被允许来渡口的。显然，这已说明安以文是自己要求离开重庆，并经领导同意才调来渡口的，并非什么人安插来的。

当我们的谈话进入正题后，安以文说，他调来时渡口只有特区党委和建设指挥部，后来才建立渡口市的，市委和市政府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集中主力抓钢铁基地建设。渡口市接受四川省委和冶金部的双重领导，具体工作则由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抓，当时是程子华同志负责。围绕渡口建设，他给我们介绍了四个方面的情况。他说，一是渡口建设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统一思想认识是个大问题。起初，没有住宿的房屋，更没有水和电，路也是建设队伍到来后新开出来的。当时，大家都住帐篷，洗脸水都要下到金沙江边去打。为此，我们曾开展过“是先要有人，还是先要有房子”的讨论。我们党委提出，要“以一通带三通”，发扬延安精神，学习解放军，真正做到不怕苦，不怕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抢速度；要先打好水、电、路三通的歼灭战，以保证矿山开掘、工厂建设等，使后续部队进来站得住，展得开。当然，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只求进度、不讲核算、不计成本的问题。

二是要大胆创新。打破过去办钢铁企业的老框子，规划、设计都要创新，从备战需要出发，做到布局分散隐蔽。当时，光设计人员就有3000多名，都做到了深入现场，联合作战，甚至做到几个设计人员在同一张图纸上作业。原来计划是“三年准备，五年建成，1972年出钢”。后来，为落实毛主席“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的指示，各项准备工作都大大提前。我们学大庆，从1966年开始搞大会战，提出68年出铁，70年出钢。我们政治部提出“以提前建成钢铁基地为纲”的口号，认为提前建成钢铁基地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因为大家都知道，渡口建设不搞好，毛主席老人家睡不好觉呀！真没有想到，却犯了“以生产建设压政治的错误”。

三是从备战需要的实际出发。我们提出走厂社结合、城乡结合的道路。我们不但要抓工厂、矿山的勘察设计与建设施工，抓钢铁、煤炭的生产，还要抓农业，组建农村社队，发展蔬菜、粮食和肉禽蛋的生产，以保障后勤供给，使渡口真正成为“打不烂的备战基地”。

四是结合建设需要开展思想工作。我们的人员是从四面八方调来的，要组成一支团结战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化建设大军，除了必须使每个人都知道毛主席有关渡口和三线建设的各项指示外，还必须抓好“老三篇”的学习，请老工人讲这里的筑路史、建厂史、开矿史，搞“思想磨刀”运动，树立艰苦创业思想，搞好三线建设。同时，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与大家同甘共苦。为此，特区党委做了“三不准、两一样”的规定，就是各级领导和机关不许请客，不许搞舞会，不许购置沙发；干部和职工要住一个样，吃一个样。

安以文的介绍，同我们在职工群众中广泛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上吻合。渡口不但不像江青所说的那样，“只挂刘少奇的像，不挂毛主席的像；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宣传贯彻和执行毛主席有关渡口和三线建设的指示”，相反，这儿到处都挂有毛主席像，喊“毛主席万岁”，而且做到了毛主席有关渡口和三线建设的指示家喻户晓，连老人和小孩都知道，渡口建设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安以文也并不像江青说的，是所谓“叛徒”安子文的弟弟。渡口市的主要领导干部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他们是努力执行和宣传毛主席有关渡口建设的指示的，渡口建设的实绩本身就是实证。应当肯定地说：渡口并没有被什么坏人所控制，而是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那么，渡口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根据广泛调查占有的事实材料，得出结论：由于渡口偏僻，交通不便，又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这里的领导和群众对外面“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了解得晚些，也少些，直到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北京市委改组后，渡口的群众组织才聚集起来沿金沙江游行，庆祝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但他

们对“文化大革命”并不理解，对如何开展的意见也不统一，有的主张要先试点，有的主张立即全面铺开，有的主张有步骤地分批分期开展。当时在成都的李非平打电话传达了省委的要求，他们才勉强要各单位党委书记，分区分批地开展运动。由于思想没跟上形势，他们提出的口号是“顺打歪风邪气，横扫牛鬼蛇神”、“西瓜要摘，芝麻也捡”，仍强调“把渡口建设成打不烂的备战基地是最大的政治”，并要求运动要坚持“以提前建成钢铁基地为纲”。这样一来，大字报多是揭发本单位内部人和事的，斗争矛头不但没有指向“当权派”，反而指向了各单位的职工群众，渡口市委领导自然就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后来，群众的大字报蜂拥而来，揭发市委领导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安以文是负责政治工作的，自然首当其冲。加之在1960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安以文就受到了批判，他此时害怕给自己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就组织机关干部对群众的批判进行解释与反驳。这样，群众的愤怒就愈益集中到他身上。还在1967年初，安以文就被全市十多个群众造反组织罢官，限制行动自由，勒令他老老实实呆在家里，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组织的审查批斗。

我们到渡口时，市委和建设指挥部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成都军区在1967年1月4日传达了总参的电报，命令以铁道兵第五师为主，会同市人武部和附近驻军，共同组成“联合指挥部”，负责组织指导渡口的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铁五师政委袁岩波在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渡口的情况是复杂的，除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外，由于人员是从四面八方调来，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也严重。”他们准备在作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后，在弄清情况、分清性质的基础上，引导群众组织大联合，逐步建立和健全生产领导班子，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使生产停顿的开工，生产下降的搞上去。他说：“渡口的建设不能被拖延，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建设要快，但不能潦草’的指示，早日把渡口建设成‘打不烂的备战钢铁基地’。”

通过一个来月的采访与调查，我们有根有据地如实向“记者站”汇报：渡口的领导干部虽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们是努力宣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指示的。应当肯定地说，“渡口在我们手里。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在这里确实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 《百年潮》 2007年第12期  
~~~~~

【口述历史】

风雨八十载——洗恒汉自述（节选下）
· 洗恒汉 ·

第五章 矛盾由来
◇ 来了新搭档

1973年12月，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对全军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与我工作上合作很好，同时也很受广大干部拥护、深孚众望的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当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同志则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中央的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和我们这些新搭档一起分别照了像，并语重心长嘱咐大家要团结一致，努力把工作搞好。与我和韩先楚照像时，毛主席特别指着我对韩先楚说：“洗恒汉是个老实人，你到了兰州后，可不要欺负他呀！”我们听了都哈哈一笑，认为是主席开玩笑。

12月，我奉命去福州亲自接韩先楚来兰州上任，当时的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同志曾私下对我说：“我把一个瘟神给你送去了，你可要当心啊！”我心想没那么严重吧？听过后也就没有放在心上。韩先楚这个同志我不太熟悉，因为从来没有在一起工作过。这个同志在战争年代是很有名气的，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1955年授衔时被授于上将军衔。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一直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和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根据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执行了对福建省的“支左”任务。因此，他实际上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以及党委第一书记。党、政、军大权在握，集四个第一于一身的“福建王”。

兰州军区是一个条件艰苦的军区，地处西北，自然环境恶劣。干部基本上都是解放大西北时一野的同志，还有后来调入的一些干部。这些同志长期工作、生活在西北，世面见得少，还是延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显得“土”一些。我们过去的司令员张达志同志也很“抠”，尽量削减不必要的开支，生怕多花国家一分钱。后来皮定均同志来了，皮司令也是这个作风。因此，到我免职的时候，我们兰州军区已给国家节约军费将近一个亿。后来的领导盖新的司令部办公大楼用的就是这笔钱。

韩先楚同志调来兰州军区后，只保留了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头衔，其余的三个第一都没有了。再加上西北地区比福建沿海环境要艰苦得多，战略地位也没有福州军区重要，气候恶劣，部队又少，因此，他是带着一肚子牢骚来上任的。

初到伊始，韩先楚便嫌兰州军区“土包子”，房子不好，门前的树象烈士陵园，喝的水不卫生，宿舍里没有配备电冰箱、彩电等，弄得我们管理局的同志好一通忙乎：把树移走；专门派几个战士每天到五泉山给司令员背泉水喝；赶紧配备电冰箱。管理局的同志觉得光给司令员配冰箱不合适，于是，给我家也搬来了一台，我家里从此也第一次用上了电冰箱，我记得是沈阳出的单开门的，不知是什么牌子。管理局的同志私下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伺候的首长。”生活上的问题好解决，工作上的分歧也随即而来了。

这里还要讲一个历史的问题。一是韩先楚在福州“支左”时，曾支持打砸抢分子陈佳忠，这个人搞武斗很凶，打倒了一大批领导干部，1974年中央还专门为此发了解决福建问题的第九号文件，特别指出和批评了韩先楚在福建工作时的错误，为此，他很不满意，曾去问过李先念同志，九号文件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李先念对他讲：“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参加了中央的讨论，也举手赞成成了的。你怀疑是‘四人帮’搞的，恐怕没有多少根据，这是个对中央的态度问题。”把韩顶了回去。

二是韩先楚与林彪关系密切，在福建他曾支持周赤萍出版了为林彪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9.13”以后，毛主席召开中央会议，在会上亲自点过他的名，在林彪事件上犯错误的几个大军区领导进行检查，韩先楚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这些，他总觉得把他这样一位历史上有战功的上将调来这个“鬼地方”当司令员，实是在大材小用，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他不信任、不重用。因此，韩先楚同志调来兰州后，就以身体不适应西北地区为名，长期住在北京或外地看病休养，从来没有象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那样扎扎实实抓过工作。实际上从1973年底到1977年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之前的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兰州呆的时间还不到两年。

当然，韩先楚同志在兰州时，也曾下过几次部队检查工作，也亲自勘察过部队的战场设置和边防建设。军区广大的指战员也慕其过去战功显赫的名声，殷切希望他能象前两任司令员张

达志、皮定均同志那样，对工作提出指导性宝贵意见。但韩先楚同志却不是这样，他走到哪里，指责到哪里，这也不对，那也错误，全盘否定兰州军区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大到战备训练、战场设置、边防建设，小到军区大院的绿化，全部都不对头了，全都要改过来，甚至是中央军委定下的问题，都要改变过来，要按他的意见办才对。

说个老实话，兰州军区自1955年成立以来，我和张达志、皮定均两任司令员以及军区其他领导同志都一贯非常重视战备工作，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各总部在各个时期的作战部署和有关作战命令、指示。军委和总参每次作战会议，我们都召开专门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会上将毛主席、周总理和各位元帅的有关作战理论、方针、原则和指示不走样的印发，组织与会同志认真学习、讨论、领会，并结合本军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落实的措施，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在兰州军区成立的二十几年中，我们无论是在五十年代平息青海、甘南藏民暴乱，还是在59年平息西藏达赖喇嘛叛乱，以及1962年解决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我们军区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表彰和嘉奖。60年代中苏论战激烈，兰州军区的战略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大后方”一变成为“反修前线”。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的防务十分重视，赋予军区的作战和战备任务十分繁重。1966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毛主席很不放心西北地区防御战备情况，特派周总理率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政委廖汉生以及我和张达志同志一同视察了新疆、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的战备情况，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三大军区共同商定了作战部署方案，报经毛主席批准实施。在以后的设防重点、部队部署、战场设置以及国防工程施工等方面，兰州军区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人烟稀少的戈壁滩上，经过五、六年极其艰苦的工作，有的同志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花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材，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改变了过去“有边无防”的状态。

而韩先楚同志到兰州后，只是坐飞机在空中盘旋观看了一下，便武断地指责，这样的设防是“胡闹”，要改变原有的所有设防，并向总参、军委报告。总参、军委明确指示：“不能改变原方案，如需作个别调整，可报意见。”韩先楚对别人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对总参谋部的指示置之不理，未经总参同意，擅自调换设防部队。总参得知后，对军区提出批评，韩却借“治病”外出不归，把他一手制造的矛盾甩给别人。

有些同志对我讲，韩先楚是上将，在福州是“四个第一”，来兰州后，三个“第一”没有了，又在中将的领导之下，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不服气。对于这些同志的提醒，我都告诉他们，不要随便揣测别人，韩司令员资格很老、水平很高、功劳很大，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很多。至于我在兰州军区任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以及省革委会主任等，那是中央定的，我个人并不想要这“四个第一”。

◇ 上书毛主席

韩先楚在福建长期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到兰州军区来很不习惯。对于他的一些作法，军区的部分干部有看法，我个人也觉得他有些“霸气”。但作为党委第一书记，我的原则是大局为重，团结为上，首先要维护韩司令员的威信，工作中要尊重他的意见，尽量求大同、存小异，减少分歧。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韩先楚任福建省党政一把手七年多，他也积极贯彻了“文革”的那一套，给福建省造成的危害和破坏也不小。他支持全国有名的打砸抢头子陈佳忠，打击迫害了福建省和福州军区一大批干部，逼死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以及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积极批邓等，比起甘肃省和兰州军区来，他在福建的所作所为要严重得多。福建省和福州军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反映强烈，在他调走后，给兰州军区寄了不少小字报和揭发材料，还有人专程到兰州来反映和去

北京上访。党办告诉我，问怎么办？我说：“一律扣住，不要散发出去。福州的事情我们不管。”有意识保护了他。

韩先楚同志还利用各种场合无中生有到处散布兰州军区有“山头”、有“宗派”、有“圈子”、有“摊摊”、“排挤外来干部”、“对外来干部不信任、不重用”等。他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各种场合乱讲，结果造成干部之间的不团结以至相互猜疑。由于兰州军区二十多年来领导班子一直比较安定团结，这种破坏组织原则的事情军区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令人感到吃惊并且反感。还例如在有的大会上，韩先楚事先不打任何招呼便突然大谈军区存在“山头”“宗派”等，搞得许多基层的同志不知所措，纷纷问回去如何传达？我只好给大家解释，要正确理解韩司令的讲话精神，给他打圆场。

韩先楚的霸道作风还反映在日常工作中，比如，有些事情很急，军委和总政催着要报，由于他长期在外地养病不归，军区党委集体讨论通过后电话或电报征求他的意见，他又不讲，可事后却大发脾气说：“我又没有死！”等等。在韩先楚等的干扰和发难的情况下，军区机关、部队很多正常工作难以开展和进行。军区几个原领导也将精力放在时时、事事提防韩抓辫子、找岔子和穿小鞋上，不敢全力抓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和机关的几个领导同志多次向我反映，我对此情形也十分为难和焦虑。韩先楚是司令员，对他的做法我实在不好说什么，更不便出面处理。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于1975年9月向党中央、毛主席、叶、邓副主席写信报告了韩先楚同志来兰州后的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军委帮助解决。

当时毛主席看了报告后，委托叶剑英副主席解决。叶帅给我打了电话：“你的报告毛主席已看了，要由军委派人去帮助处理。”1975年12月，经毛主席批准，由军委派出以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为组长的庞大的工作组，以检查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名义来到兰州军区进行调查，协助解决。

工作组来了后，找当时的军区领导和各大部主要领导逐个进行谈话，并找了一大批二级部长和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觉得双方认识和分歧太大，一下子很难消除和解决。所以，直到工作组返京，都没有同军区领导坐在一起，面对面谈问题，进行调解，更没有明确表态，指明谁是谁非。只是说回北京后向军委报告，听候军委指示。直到1977年我免职，长达近两年时间，也未见中央军委对此有任何一点指示和说法。这样兴师动众一番，最后弄了个不了了之。韩先楚自此后更加我行我素，不把军区任何领导放在眼里。

◇ “谈心会”始末

关于谈心会的问题，我认为军区党委常委开个谈心会，完全是党内正常生活，并且是韩先楚同志提议召开的这个会，也是他和我共同主持召开的。

1976年7月30日，我从农村视察工作回来，晚上我去看郭鹏同志，郭说韩司令身体不好，我说明天我去看他。第二天我去看韩时，韩先楚提出要召开常委谈心会，我当时表示，现在谈恐怕时机不成熟，谈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谈不好还会引起新的矛盾。但韩先楚态度很坚决，坚持要立即开，我也不便坚持，只好同意。

8月4日起至11日，我们兰州军区党委召开了常委和军区顾问参加的谈心会。会上，我是本着交心通气、消除误会、寻求团结的精神，讲了自己的意见，也对韩先楚同志的一些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评。别的常委同志和顾问也都发了言，也有给我提意见的，也有对韩先楚同志提出意见的。但韩先楚在听了大家的批评后却很不高兴，他在会上既不交心，也不做一点自我批评，只是表示要保留意见，但会后却到处讲说我是借谈心会故意整他。结果根本谈不拢，谈心

会开了个不欢而散，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众所周知，谈心会并不是我要召开的，当时我还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开会时机并不成熟，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而正是韩先楚自己的极力坚持才召开的，怎么能说是我召开谈心会有意整韩先楚呢？参加谈心会的很多同志都还在，会议的记录应该还保存在党办，这些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讲话呢？

会上，有的同志还批我是在跟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甚至是四项、五项指示为纲（都有记录在案）。我在会上对韩先楚提出的意见，主要是工作上的矛盾，特别是他曾经说兰州军区有山头、有宗派、排外等。他的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下面到处讲，我对他的这些说法和搞法是不满意的（对此，我还以个人名义向毛主席、叶、邓副主席写信反映，请求中央调查解决）。

按照中央规定，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决定，把每个人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由个人审阅后上报中央军委。可会后，韩先楚同志又迟迟不愿意上报，但同时却又违背党的纪律，私自把常委会记录拿到北京、武汉去，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不断向军委某些领导吹风、打“小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高维嵩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反映谈心会情况。他的秘书拿给我念时，我是表示同意的。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党中央发出了一级紧急战备命令，明确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昼夜坚守工作岗位，以防不测。当时韩先楚正在北京。军区接到中央电令后，我当即指示参谋长马友里同志打电话向韩报告，请他尽快返回兰州坐镇指挥，部署军区部队的战备工作。可是韩先楚却在电话中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天不会塌下来。家里不是有那么多领导吗！为什么非要让我回去不可？我不回去，请别人代理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只好由当时分管作战的李书茂副司令员组织机关作了传达部署。

可是，1977年7月兰州军区党委四届六次全委会上韩先楚在总结发言中却反咬一口说：“……尤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时，中央发出一级战备命令，他们（指洪恒汉、高维嵩、李书茂）竟延误几个小时不传达、不部署。”并将此事作为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战备工作”的罪状。关于我和韩先楚之间工作上的矛盾，到北京开会时，也曾向当时主管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作过汇报。当时叶帅并没有表态，只是说：“你们两个是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两只公鸡，你们说怎么办？”我当即表示我愿意调走，叶剑英还给我做工作说：“你在兰州时间长，情况熟悉，身体也不错，还是不考虑调走吧。”

◇ 中央派来了肖华

1977年4月，中央军委突然任命肖华来兰州军区任政治委员。在下达任职命令之前，军委、总政没有象通常那样给我们打招呼、通气，也没有征求过意见、说明意图。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非常敏感的时期，这是很能引起人们猜测的。

我本人也弄不懂上面是什么意图？我还曾经为此打电话请示过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问中央军委调肖华来兰州军区任政委，上面有何考虑？由于他曾当过总政主任，来后位置如何摆法？得到的共同答案是：“因为你的主要精力是抓甘肃地方工作，调肖华去是为了加强军区领导力量，没有什么别的考虑。至于到兰州后的位置摆法，按先来后到，你为第一，他为第二，协助你抓好军区部队工作。”肖华来兰州后，也多次对我讲，他是调来协助我抓好军区部队工作的，他来第一没有带什么人的指示，第二没有什么框框，是“协助洗政委工作的，”并说对此感到很高兴等。

但是肖华来了以后，却并不是象他所宣称的那样，而是象一位钦差大臣。他把架子端得很高，在并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对军区的工作多方指责，并明确表示兰州军区领导对清查“四人帮”工作很不重视，抓得很不得力。还煞有介事地说，有人在“捂盖子、保自己”。由于他曾任过总政主任，我对他还是比较尊重的，但是他下车伊始，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兰州军区主要领导怕联系实际，怕揭深揭透等，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并给我们的清查工作定了“框框”，“要密切结合军区实际情况”，集中揭发军区主要领导与“四人帮”的关系。

1977年4月下旬，军区召开了师及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中央关于清查“四人帮”阴谋活动罪行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及部署对部队进行正面教育的工作。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刚刚调来还不满半个月的肖华和韩先楚联合起来，首先转移会议方向，既不揭批“四人帮”罪行，也不研究对团以下部队如何进行正面教育问题，而是带头对我搞突然袭击，煽动大家集中揭发我与“四人帮”的关系。由于没有揭发出什么问题来，他们又要求与会的每个人亮相，表明态度。当时会议上对他们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如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副司令员李书茂、杜绍三，军区顾问组长郭鹏，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孙殿甲，副主任李世祥，后勤部政委齐振兴，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青海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政委宋长庚，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等同志，在后来的清查运动中，无一例外受到打击迫害，统统被定为所谓“洗家帮”的主要核心或骨干、亲信，先免职后审查，有的则被关押。

肖华这个同志原来作过总政主任，在工作上他是我的上级，我对他一直都是很尊重的，我和他的关系完全是工作上的接触，没有私人交往，更没有掺杂任何个人恩怨在里面。对于他搞“莫须有”，一定要把我整成所谓“洗家帮”并以此为借口整掉了一大批干部的行径，我考虑了十几年，都没有想明白其中的原因。回想起我和肖华以往的工作交往，感到这个人是有不光明磊落。关于在兰州军区“四大”中他所扮演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以及先定调支持后拒不认帐并嫁祸于人的角色，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众所周知他在罗瑞卿同志问题上的表现，就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在罗瑞卿同志落难时，他提供炮弹，落井下石，并主持发动全军揭发批判；在罗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对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政治上投机多了，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风派”本质，因此，这也就不难解释热衷于宣传“认识英明领袖、了解英明领袖、熟悉英明领袖、忠于英明领袖”的肖华，在华国锋下台后便又立刻抢先批判华国锋了。

肖华的政治品质在我党几次党内斗争中都有所表现，例如，1957年反教条主义，他就积极追随林彪，整了刘伯承元帅。又如，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他又跳出来揭发彭德怀元帅“里通外国”，在访苏期间和赫鲁晓夫私下谈话反对三面红旗。彭老总解释说，他不懂俄文，赫鲁晓夫不懂中文，又没有翻译在场，两人如何密谈？彭老总的这顶帽子一直戴到平反昭雪。1961年肖华又紧跟林彪，利用“端正政治工作方向”之名，整了总政主任谭政和副主任刘志坚、甘泗淇、傅钟等老同志。升任总政主任后，随之又整了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同志。后因文革期间在写检讨时犯生活作风错误，听说江青骂他是“花花公子”，因此，“四人帮”垮台后肖华便又成了受江青迫害的英雄。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将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等找到西山叶帅的住所，专门谈了贺龙同志的问题，说我们三人都是贺龙的老部下，给我们先打个招呼，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在谈完出去后，肖华又赶上来对我讲：“邓小平已被中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了，你是红七军出来的，要认真回忆一下，要揭发，态度要明朗。”我当时就说：“我在红七军是当兵嘛，知道什么？”后来回去后，无论是关于贺龙同志的问题还是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我们几个都达成默契，即不理睬、不揭发。这些事情已

经过二十多年了，时间早已还历史于其本来面貌了，当时的混乱思想也经过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得以彻底澄清。由于历史的原因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并没有谁去翻箱倒柜搬出来刻意追究，倒是许多往事都已经淡忘了。然而肖华本人是否还因心虚而耿耿于怀，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于一个挂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桂冠的人来讲，作这样的猜测是否有些不合适？

肖华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韩先楚一起，搜集我的材料，给我罗列罪名，然后到中央、军委找关系吹风、打小报告，走政治后门，以达到置我于死地的目的。打倒我，这是肖华到兰州军区来干的第一件也是他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事后他曾多次对人炫耀过，并且在1985年调离兰州军区的告别欢送会上作为发言总结道，他来兰州军区工作七、八年，取得的最大政绩就是“彻底摧毁了洗恒汉苦心经营了二十几年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同时，他还信誓旦旦：“将来若是有人出来翻这个案，你们就直接写信给我，我为你们做主。”在甘肃省委，宋平、冯纪新看肖华的眼色行事，提心吊胆惟恐闪失；在军区，这么大的案子只听他一个人的，连中央具体参与此案的人都整天围着他的指挥棒转。

想想参加革命也半个多世纪了，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也都过来了，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是，免职这么多年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找我谈一次话！所谓的“结论”也在没有同我本人见面核对的情况下就批了！到底是可悲？还是可叹？不是说“对人的处理要慎重吗”？对干部“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吗？党的这些干部政策经过肖华们的转手处理后已经在下面变味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共产党内的悲剧。（完成于1987年6月）

第六章 后记

写完这部自述后，不觉又过了几年了。该说的话说了，心里觉得轻松不少。今年是1990年，我也是80岁的人了。常言道，人活七十古来稀，如今九十岁也是常见的事，看起来这句俗语要改改了。

这几年一些政治待遇稍稍开始解冻，恢复了党籍，可以学习一些文件，参加一些会议，也经常被邀写一些战史、军史方面的回忆录，一些中央同志来访，年节日来探望等。但又是几年等下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迹象。曾经有过一次，军委和总政某首长检查工作，还专程看了我，听了我的申诉，并信誓旦旦，许愿回京后一定立即着手复查我的问题。但一个月、二个月、半年……在我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等来了因为党内又一次内部斗争，而我的问题也随之搁浅的消息。

有时心里愤然，思忖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当初十年汗水，十年操劳，十年忧国忧民，一腔热血尽抛，到头来却被当做筹码成了某些政客间权欲斗争的牺牲品。有时心里又坦然，扪心自问：于党于国自己是尽心尽力的了。时间过的真快，转眼即是八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有资格闭目静思总结人生了。

纵观一生，自我评价还算是功大于过吧。期盼中的组织上重新审查我的所谓“结论”，看起来有生之年是等不到了，是非功过，褒贬由人吧。八十年的风风雨雨，自认为还算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家庭、对得起后代。

平生无甚嗜好，只是：

最大的心愿：老天下雨，缓解旱情。

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新闻联播。

最想听的是：时事民情。

最怀念的人：贺龙元帅。

最想说的话：该说的都说了。

留给老伴的话：我一生两袖清风，什么也没有留下。

留给儿女的话：守法。

这几年又经历了许多：“6.4”事件、苏联解体、苏共解散、改革开放——总的来说，有的理解有的不太理解。但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这个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虽然近十年不太出门了，但从电视、收音机里看到、听到，从家人、朋友口中听说，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和老百姓富裕了，这一切使我由衷欣喜，我们革命那么多年，牺牲了那么多人，为的就是国富民强的这一天。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我们无数共产党人的努力就值得。至于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党内腐败、违纪等现象，相信滚滚向前的历史一定会涤荡这些污泥浊水，我坚信，明天更灿烂！（写在1990年11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